

內地跨境及新來港學生的文化及 公民身分

袁月梅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本文是一項質化研究成果之一，旨在從三方面探討香港內地跨境及新來港學生的文化及公民身分認同：（一）對香港社會的觀感，（二）對「香港人」或「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和（三）希望將來生活居住的地方等。資料來自六所香港小學；研究方法包括：學生、老師、校長和家長訪談，課堂內外伴隨觀察，圖象辨識（內地及香港著名政治人物及地標名稱）及書寫短文「我的國家」等。本文主要報告學生訪談的研究成果。研究發現兩組學生對香港社會普遍持正面觀感，但對社會整體政治、民生民情認識極為有限。在文化及公民身分認同上，跨境學生比新來港學生更是處於過渡和摸索的階段，介乎於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因此，他們對期望未來定居的地方也較新來港學生不肯定，而礙於地理環境阻隔，對香港社會的歸屬感也不強。反之，新來港學生雖然對自己是中國人的意識比較強，卻較為肯定指出喜歡在香港定居。

關鍵詞：內地跨境學生、新來港學生、文化及公民身分

引言

內地跨境學生泛指香港人在內地結婚生的子女，父親一般為港人，母親為內地人，家住深圳、鹽田、福田一帶而跨境到港接受教育的香港居民；新來港學生則指從內地移居香港，父親多為港人而母親為內地人，來港定居三年或以下的學生。本地相關的研究以探討跨境學生和新來港學生的學業和社交適應需要為主（李榮安、袁月梅，2003；袁月梅，2003、2004a、2004b；陳永昌，1999；陳茂釗、葉建源、袁文得，1997）。新移民（及其他少數族裔）的公民身分是社會公民概念的重要指標，而香港新移民的公民身分認同則是一個很少被探討的重要研究範疇。

新移民的公民身分

學者（Kincheloe & Steinburg, 1997; Parekh, 2000）指出新移民採取以下的三種模式適應新社會：（一）被新環境同化。傾向接受和認同主流新社會的價值觀而否認或約束個人的傳統文化和身分；（二）與主流文化保持隔離。除了是對新社會不感興趣外，亦只選擇與鄉里或背景相同的人交往，從而能保留或突顯出他們原居地的獨特文化身分；（三）積極融入新社會。既勇於接納主流社會的價值和傳統，亦樂意保留原有的文化身分。學者認為，積極融入是一種較自然和不偏離的選擇，重視內在個人的因素和外在環境的因素。主流新社會現存的政策，均可能影響社會對移民的接納或排斥。但是按 Porte & Zhou（1993）和 Zhou（1997）對早期美國移民經驗的研究觀察，發覺移民家庭的社經地位直接影響下一代的社化過程，產生向上和向下移動的兩極化現象。為要在新社會裏得到肯定，移民多是主動地被主流社會同化而埋沒個人原居地的文化傳承，而教育本身已是一個同化的過程。

Cogan & Derricott（2000）指出，學校教育傾向給予學生一種國家身分認同感，讓學生對國家感到自豪，教導他們的社會公民權利和責任。Banks（2004）認為公民普遍擁有多於一種的身分，包括文化

(cultural)、國家(national)和世界(global)三個層面。Heater (1999)、Kymlica & Norman (2000)把公民身分分為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tic)、公民(civil)及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三方面。Heater (1999)更進一步把公民身分區分為涉及階級(公共、政治和社會)和結合個人情感的兩種文化身分。

Weinrich (2003)指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身分在某些層面可能會產生變化。身分結構分析(identity structure analysis)包括：評估、現時身分的表述、確認及身分的形成和發展。Bhugra (2005)強調兩個要點，「一是種族、民族及文化身分是一個人身分的組成部分；第二是身分的建立和因文化適應而帶來的身分變化，都會改變身分的結構從而令身分有所變化。」

學者認為跨文化身分(cross-cultural identity)的建立是移民者成功過渡到一個新的國家的象徵(Lupi & Tong, 2001; Tong, 1997; Tong, 1998)，他們能夠平衡家庭和學校文化的價值。這個全新的自我結合了兩個文化的價值、信仰、習俗及行為模式，令個人感到自在。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是這些個體所接觸的兩種文化是共生和互補，而並非互相競爭的(Tong, Huang, & McIntyre, 2006)。

李榮安(2003, 頁4)指出多國在公民教育的共同爭論和關注都包括：國民身分認同不足、公民素質不夠理想和民主實踐的需要改進，故此應循對民主的理解和態度、國民身分認同和社會的凝聚與分化等方面去研究。

Apple & Weiss (1983)認為教學的過程和成果會因應學習者個人的種族、性別、階級與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範疇持續互動的，故此，教育不能忽視學生這些個人特性和需要。

研究方法

本文的質化研究以系統化取樣方法，選擇了六所小學(三所包括新來港學生及三所包括跨境學生)，透過系統化課堂觀察和半結構性學

生、老師、校長和家長訪談，以及學生書寫「我的國家」短文一篇，主要探討受試學生對香港的觀感、語言文化及公民身分的認同和歸屬感。本文則集中報告學生訪談（附錄一）資料分析的結果。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十八位受訪學生包括九位內地跨境學生和九位新來港學生。他們先由校方建議，再取得家長書面同意後參與是次研究，每所學校選三位學生，分別是入學第一年、第二年及第三年或以上，共訪問了九名內地跨境學生及九名新來港學生。

在本研究中，內地跨境學生的年紀為六、八及十一歲，分別就讀一年、三年及六年級，就讀學校位於於新界或邊境。其中五名跨境學生在內地出生，其餘的在香港出生，後返內地生活。八名跨境學生於幼稚園時已入讀香港新界或邊境學校，全部按年齡升讀而沒有降班情況，每天約花個半至兩小時往返學校。另外，九名新來港學生全是在內地出生，年齡為八、十一及十四歲，分別就讀二年、四年及六年級，就讀於新界、九龍及香港島的學校。招收新來港學童的學校遍佈全港，當中以新市鎮及市區學校為主。九位新來港學生均以插班方式入讀香港的學校，由於他們的英文水準偏低，通常會被安排入讀比同年齡學生低一至兩年級的班別。

結果和討論

語言與身分

Banks (2004) 提及公民普遍有多重身分，語言是個人身分及地位的象徵，也是文化適應程度的決定因素之一，掌握主流社會語言的能力往往是移民學生的新身分的指標 (Tong, 1997, 2002)。從訪談資料發現，大部分跨境及新來港學生（各六名）均喜歡說廣東話，他們自稱是因為

「已經習慣了」，其中一位跨境生自言「不太懂普通話」，兩位學生較喜歡說普通話；只有一位新來港學生喜歡說家鄉話（見表一），只有少部分新來港學生初時有廣東話發音不正確的問題。

結果又顯示，內地跨境學生中有七名表明在家中都會混合廣東話和普通話／鄉下話（開平話、新會話）與母親溝通，一般來說都以廣東話為主。依他們所說：「大多數是廣東話」、「在家中慣常用白話（廣東話）跟父母溝通」、「平時跟家人說香港話……跟媽媽說潮州話」、「有時講廣東話，有時講普通話……最常用廣東話」。為了協助子女適應，有些跨境學生的內地母親都開始學廣東話：「從前都是跟她說潮州話，到了她上一年級，我就慢慢學廣東話。」

因為新來港學生多在內地長大，在家較多以普通話或方言與家人溝通，慣用的一般家鄉話是開平話，亦有三位以廣東話為主。新來港學生在家外或學校就會說廣東話，從訪談和觀課資料中顯示，個別新來港學生經常喜歡與背景相同的同學交往，像一個小圈子，課餘時用家鄉話交談，加強彼此對原居地的文化背景認同，亦突顯出地域文化差異，令其他人難以融入他們的社交圈子。

總的來說，語言的適應並不是一個重大的障礙，只有一位學生說喜歡鄉下話多於廣東話。但他們是以廣東話為一種日常的溝通語言，明白本地人說話之間的地道港人文化則是一門學問，是一種新的文化及公民身分的改變和適應。整體來說，香港學校教育是以同化移民學生為取向，極少鼓勵學生保存家鄉話，而這兩組學生對於以廣東話為主的學習生活一般是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正如 Porte & Zhou (1993) 和 Zhou (1997) 所指出的為了在新社會得到肯定，他們傾向融入新環境和認同主流價值觀，例如：講鄉下話不被香港主流社會或朋儕所重視，他們就更樂意說廣東話並且以此為榮。

對香港社會的觀感

在學生的訪問中，大部分跨境及新來港學生對香港有正面的觀感，而且意見接近，一般認為香港人較有禮貌，香港景色漂亮，環境比內地

表一：學生喜歡採用的語言

新來港學生	跨境學生
<p>廣東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喜歡用)白話。」 • 「(我最喜歡說)廣東話，(因為)已經適應了。」 • 「(喜歡)廣東話，因為講慣了。」 • 「(喜歡)廣東話，因為清楚，別人聽明白。」 • 「(喜歡)廣東話，可能因為我的普通話音調不太準。」 • 「(喜歡)廣東話。」 	<p>廣東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喜歡說)香港話，因為習慣了。」 • 「(喜歡)白話，因為白話很好聽和順暢。」 • 「(喜歡說)廣東話，因為我用慣了廣東話。」 • 「她比較喜愛用白話，因為說起來較容易。」 • 「廣東話，因為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夠標準。」 • 「(喜歡說)廣東話……因為我懂廣東話多一點，我不太懂普通話。」
<p>家鄉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鄉下(話)，(因為)說慣了。」 	<p>普通話</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普通話……因為我只懂普通話，別的方言我只懂一點點。我懂得普通話最多，我只懂很少廣東話。」 • 「白話和普通話……因為普通話很簡單。」
<p>其他</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知道。」 	

清潔，有很多觀摩及遊樂的設施如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等。相反，有兩位新來港學生指出，香港的樓宇陳舊、環境受到污染等問題。但大多數受訪學生都選擇在港定居（見表二）。學生對香港這東方之珠的正面觀感都是圍繞著一些學校經常安排參觀的地標而說，而且與大眾傳媒的報導相似。至於社會整體政經、民情、政制、民主等問題似乎與他們沒有關係，則絕少談及。少部分新來港學生輕輕談及社區環境，而跨境學生則純以香港地標為題，這很大程度是與他們的生活圈子和社會涉獵面的局限相關（這也可從他們不能辨識內地總理和香港特首名稱，香港天星小輪、電車及纜車等圖片反映出來）。從上述的資料推論，基於這兩組學生家庭的文化及社經背景的限制，學校教育會是他們其中一個最重要認識香港社會政經和民情的途徑，從兩組學生對香港社會的一般觀感和內地、香港政治人物及代表性的交通工具圖象辨識，多少反映出學校的國民教育不強，政治意識也不強。由此可引證香港學校教育傾向

只重視協助這些同學的學業成績，推出提升英語和寫繁體字、粵音正讀等措施（李榮安，袁月梅，2003；袁月梅，2003），而忽視了他們的文化和公民身分意識的教育。又或採取「自由主義」政策，不但做不到 Cogan & Derricott（2000）認為的學校應培養學生國家身分的認同感，卻要花更多的資源塑造他們成為百分百的香港公民，更遑論使他們成為中國和世界公民了。在此，有必要再思 Apple & Weiss（1983）提出的，在教育過程不能忽視學生的個人特性和社會互動的因素。

表二：學生對香港的觀感

新來港學生	跨境學生
<p>喜歡香港</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喜歡，（因為香港）很漂亮。」 • 「人很多……喜歡（香港）。」 • 「覺得（香港）晚上景色很漂亮……喜歡香港。」 • 「（香港）有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可以遊玩，我最喜歡這兩個地方……喜歡（香港）。」 • 「我喜歡香港……（香港）有很多高樓大廈，很多車，大陸的房屋比較矮。」 • 「香港很好，因為香港的景色很美，公園裏的遊樂設施很好玩，人也友善……我覺得香港可以接納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也會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p>喜歡香港</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我覺得香港很大，好像維多利亞港很美，有時晚上有煙花，高樓大廈有燈火，我覺得很美。」 • 「環境比較清潔，而且人們的談吐比較有禮貌……對（喜歡香港），因香港比較美，也有較多娛樂。」 • 「喜歡（香港），因為香港什麼商品都有，媽媽每次回港也會買很多東西給我。」 • 「我很喜歡（香港），我喜歡遊樂場，香港的迪士尼樂園。」 • 「香港比內地清潔得多，人們不會隨地吐痰或大聲說話。」 • 「很好，我覺得大陸和鄉下不好……（因為）大陸只學簡體字，不學繁體字，我覺得繁體字很好。」
<p>不喜歡香港</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些喜歡（住在香港），但不喜歡香港的樓宇。」 • 「以前喜歡鄉下，現在喜歡香港……來香港之前覺得香港很漂亮，有很多高樓；但來香港之後，感覺一般，（香港）雖然漂亮，但有一些很陳舊的房子，河裏有很多污水和油漬。」 	
<p>其他</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比較深刻……在 1998 年來港時，啓德機場還未關閉的時候，每一晚睡覺時都會很嘈。」 	

希望將來居住的地方

幾乎所有受訪的新來港學生均表明會選擇在香港生活，主要原因有：「香港的福利和工資比較高」、「香港的屋很漂亮」、「我在香港住了幾年覺得不錯」等。跨境學生則有五名清楚表明希望將來在香港居住，因為「喜歡香港，可以到維多利亞港玩，可以去朋友家，又可以去爸爸的家」、「因為我在那裏出生……」等。但相對來說，跨境學生對於將來的決定則較為含糊。兩組學生的選擇主要都是以個人日後發展及利益為主導。

由於新來港家庭已經選擇來港定居，父母的意願也希望子女日後可以在港發展，所以對將來定居香港的決定比較肯定；新來港的學生也多傾向選擇定居香港。但對於跨境家庭來說，是否選擇在港定居或希望子女在港發展，顯得有較多的考慮，但似乎這些決定都是會因子女日後發展而改變，與個人對社會的認同和身分的肯定沒有直接或明顯的關係（見表三）。

表三：希望將來居住的地方

新來港學生	跨境學生
8名學生希望將來在香港定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香港居住。」 • 「(會)在香港居住。」 • 「香港,(因為)香港的福利和工資比較高。」 • 「香港,(因為)香港的屋很漂亮。」 • 「香港,(因為)我在香港住了幾年覺得不錯。」 • 「沒有想過……(希望)在香港的商業大廈(居住)。」 • 「聽我的婆婆說,將來我長大後會來香港……(長大後希望住在)香港的海洋公園。」 • 「香港,因為很懷念,像在這裏生活了很多年,再去其他地方會覺得很不習慣。」 	5名學生希望將來在香港定居,2名學生還未決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想(在香港定居)。」 • 「跟祖母住(香港)。」 • 「香港沙田,因為我在那裏出生。」 • 「其實兩個地方都可以……我會喜歡香港,因為可以到維多利亞港玩,可以去朋友家,又可以去爸爸的家。」 • 「香港,因為我對香港比較熟悉一點……但我的成績好點的話我希望到英國……因為我有親戚住在那裏,那裏生活較好。」
其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知道。」 • 「還未決定長大後在香港還是內地定居。」 • 「……深圳,因為那裏有五個遊樂場。」 	其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知道。」 • 「還未決定長大後在香港還是內地定居。」 • 「……深圳,因為那裏有五個遊樂場。」
其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知道,應該不會(返大陸住)。」 	

對文化及公民的身分認同

從學生的訪談資料中，可以看到這兩組學生對自己的文化身分和公民意識也不太清晰（見表四）。非本地學生要界定自己的身分主要有三個參考：（一）對合法權利的認識、（二）對新社會的歸屬感，以及（三）他們對原來社會固有的情感和忠誠。受訪的跨境學生中，三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另三名學生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其餘二人認為自己是深圳人／鄉下人。跨境學童日常的跨境生活使他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產生很大的混淆，介乎於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或者這才能真正反映出 Banks（2004）所指的，公民普遍擁有多種身分（文化和國家）的現實，關鍵是如何協助這一群學生面對多重身分所帶來的優勢和挑戰。按初步的資料分析，他們還是在身分混淆的境況中多於享受其中的優勢，雖然身為港人子弟，他們可以入讀香港學校，但需要比本地生犧牲不少休息和家庭樂的時間和機會。

在九名受訪的新來港學生當中，有五名學生傾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可能由於他們均於內地出生，也曾在內地接受教育，對中國有較大的歸屬感，反之他們在香港卻缺乏社交網絡。在三名新來港學生當中，其中兩名學生以「大陸人」自稱，突顯他們來自內地的背景，第三位則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因為她相信香港是一個多元和包容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人」一詞在普遍的理解中仍然帶有負面之意；他們自稱為「大陸人」，反映他們自尊心較低。

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跨境學生對香港存有正面觀感。然而，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認識不多，只有一名跨境學生僅僅提及香港交通擠逼，但似乎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只要他們喜歡學校生活和能與其他跨境同學一起便足夠，至於未來定居的地方，可以遲些才想。另一方面，大多數的新來港學生對香港比較多生活體驗，四名新來港學生在訪問中曾提及香港地方擠逼，或交通繁忙，他們對香港居住環境的感覺跟香港居民的想法也很接近。

表四：學生對文化及公民的身分認同

新來港學生	跨境學生
<p>中國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大陸人，(因為)我在大陸出生。」 「內地人，因為我始終在大陸深圳出生。」 「中國人，因為中國包括香港……不可說不喜歡香港，感覺只是一般。」 「中國同胞，中國人，因為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所以我們屬於中國人……(作為中國人)都幾光榮。」 「覺得自己(不是)香港人，(因為)還未在香港住滿七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廣東也屬於中國。」 	<p>香港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香港人比較多一點。」 「我是香港人，因為我在香港出生。」 「我的爸爸說我是香港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爸爸是香港人，我相信爸爸。」 <p>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我是香港人，也是內地人，因為我在香港出生和讀書，所以我覺得兩樣都是。」 「一半是香港人，一半是深圳人；因為我在內地出生，但卻在香港上學。」 「媽媽說我是(香港人)，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是香港人，但卻在雷州出生。現在是香港人。」(第一次訪問)、「中國人。」(第二次訪問)
<p>香港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是(香港人)。」 「即使我從大陸來，我也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p>深圳人／鄉下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深圳人。」 「(我覺得我是)鄉下人，因為我在鄉下出生。」
<p>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我的感覺是大陸人，在大陸的時間比較長一點……(現在是)香港人，因為住在香港。」 	
<p>其他</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很難區分。」 	

在本研究中，內地跨境及新來港學生以「我的國家」為題書寫對中國的感受。大部分內地跨境學生對中國有正面的觀感：「我是中國人，中國是一個繁榮和有趣的國家，它給我親切感……中國是我的國家，我喜歡(中國)是出於自然的」、「我喜歡中國的人和事，它有很多著名景點，而且很壯觀，還有人們的關懷，我覺得做中國人很光榮」、「我的國家是一個充滿繁華的城市，有不同國籍的人士都會前來拜訪，我不但可以看到現在的社會制度慢慢開放，而且還看見我的國家慢慢強大起來」。然而，其中有一位跨境學生誤稱香港是國家，以及一位跨境學生稱「不喜歡國家，因為(中國)有一些人亂吐口水和亂丟垃圾」。

另外，大部分新來港學生都喜歡中國：「我覺得香港非常好，但是我在中國大陸出生，所以我還是喜歡中國」、「我覺得我是一個中國人，因為香港也是香港的一部分，我對中國的印象不錯，因為中國有很多宏偉的古舊建築，但有些人沒有禮貌」、「我喜歡的國家是中國，因為中國有很多特別的建築物，例如：萬里長城、炮台、天安門等」。就讀五、六年級的同學對「我的國家」課題較多個人的分享，三年級或以下的同學多認為中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便完結。這兩組學生對「我的國家」這課題看作表揚國家名勝古蹟，以數個著名的國家地標來代表國家的一切思考，並作個人身分認同的聯想，答案可以說是把常識科教科書內容搬了出來，既表面和有刻板定型的感覺，毫無對政治、法律、權利和國籍的意見和批判思想，公民意識單薄也欠缺了對「國家」概念的理解，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結論

從這個初步的研究分析看，這兩組學生的文化及公民身分明顯地受到香港學校教育的同化，但也受到個人在香港的經歷所影響。從資料顯示，香港教育模式普遍以協助跨境及新來港同學盡快適應香港式的教育系統為主，對學生原有的地域文化保持隔離。雖然內地新來港學生比較喜歡在香港定居，但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意識也比較強；另一方面，跨境學生的文化及公民意識仍處於初階，對國民身分的理解非常單一和表面，加上他們在香港上學的生活只限於學校範圍，與香港社會割裂，在身分角色上有混淆的感覺是很自然的，除了可以入讀香港中小學外，沒有什麼誘因會觸動他們關心個人擁有什么公民權利和義務。

新來港學生對中國的歸屬感雖然比內地跨境學生大，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卻喜歡在港定居，當然這不能推斷他們對內地或香港社會特別有承擔。他們喜歡用普通話或家鄉話跟家人溝通，對原居地很有感情，也建立了社交網絡，在文化及公民身分方面，存在雙重身分，又因他們來港入學的年齡比內地跨境學生大，需要較長時間適應和融入社

會。但如果教育鼓勵他們保留原有的文化身分，相信他們會更積極的適應新社會。

內地跨境學生的情況明顯是，擁有「中國人」和「香港人」雙重的文化及公民身分。生活於內地和香港的邊界，跨境學童的年紀比新來港學生小，大部分在幼稚園或初小階段已開始跨境上學，這有助於他們適應及融入香港的學校生活；論到社會實況，卻只限於過境和學校的經驗，缺乏整體香港實際的生活經驗，「香港人」的稱號沒有實質上的個人體會，跨文化生活無疑地增加他們不肯定和混淆的感覺。

由於受訪的是小學生，個人焦點集中於學業成績，學校教育又對他們發展的影響比較重要，加上他們的文化及公民身分認同處於一個過渡性時期，朋輩、師長和家庭的價值觀取向，都直接影響「我是誰」和「香港與我有何關係」的文化及公民身分的形成，以致對整個香港社會的歸屬感和未來生活地的觀感。對於兩組學生的文化和公民意識的發展和學校國民教育的取向，以及如何能在學校及社會教育配合這些方面的需要，乃是本文所限，值得日後作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 李榮安（2003）。〈小學公民教育教材開展：背景、理念與計劃〉。載李榮安、徐葉慧連（主編），《小學公民教育教學策略的實踐》（頁 2–23）。香港：商務印書館。
- 李榮安、袁月梅（2003）。《新來港學生教育之校本實踐》。香港：商務印書館。
- 袁月梅（2003）。《一班兩制與教師專業發展》。香港：商務印書館。
- 袁月梅（2004a）。〈跨境學生教育：邊緣性與社會性共融〉。載袁月梅（主編），《新來港學生教育之研究與發展》（頁 53–65）。台北：師大書苑。
- 袁月梅（2004b）。《文化沉浸之旅——香港內地跨文化教育行動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陳永昌（1999）。〈新移民學童之心理適應問題〉。載陳永昌（編），《中國內地新來港定居兒童及青少年之心理適應》（頁 1–12）。香港：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
- 陳茂釗、葉建源、袁文得（1997）。《深水埗區中國內地青少年新移民的適應與需要調查》。香港：深水埗區議會。
- Apple, M., & Weiss, I. (1983).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anks, J. A. (Ed.). (2004). *Divers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hugra, D. (2005).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congruency: A new model for evaluating mental distress in immigrants.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3(2), 84–93.
- Cogan, J. J., & Derricott, R. (Eds.). (2000). *Citize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London: Kogan Page.
- Heater, D. (1999). *What is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incheloe, J. L., & Steinburg, S. R. (1997). *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 & Norman, W. (Eds.). (2000). *Citizenship in diverse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pi, M., & Tong, V. (2001). Reflecting on personal interaction style to promote successful cross-cultural school-home partnerships. *Preventing School Failure, 45*(4), 162–166.
- Parekh, B. (2000). *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 London: Profile Books.
- Porte, A., &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 – 98.
- Tong, V. (199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s and culture: Finding a cross-cultural identity. *NYSABE Journal, 12*, 43–61.
- Tong, V. (1998). Helping LEP students learn to belong in a new culture. *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7*(3), 161–164.
- Tong, V. M., Huang, C. W., & McIntyre, T. (2006). Promoting a positive cross-cultural identity: Reaching immigrant students. *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14*(4), 203.
- Zhou, M.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975–1008. [Special issue: Immigrant adaptation and native-born respons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s].

附錄一：學生訪談內容大綱

個人基本資料：

1. 名字：
2. 年齡（出生日期）：
3. 性別及年級：
4. 學校名稱：
5. 家庭成員人數：
6. 兄弟姊妹人數：
7. 住址：
8. 出生地點及國籍：

有關學習上的提問：

9. 你何時入讀此校？
10. 你乘坐甚麼交通工具上學？有沒有人送你上學？
11. 你最喜歡的科目是甚麼？為甚麼？
12. 你最不喜歡的科目是甚麼？為甚麼？
13. 如遇到學習上的困難，你會向誰請教？
14. 你最喜歡和最不喜歡學校的甚麼東西？
15. 你覺得老師怎樣？
16. 你喜不喜歡學校？
17. 你在學校有沒有好朋友？你與好朋友玩些甚麼？
18. 除了學校的同學之外，你會與哪些朋友一起玩？
19. 你覺得跨境的同學和香港的同學怎樣？
20. 你在家裏是用哪一種語言與家人溝通的？
21. 你喜歡講哪一種語言？為甚麼？
22. 你長大後希望做甚麼？
23. 你對讀書有甚麼期望？

有關生活上的提問：

24. 你曾經在哪些地方居住過？
25. 請描述你第一天在香港上課的情形。
26. 你對香港的印象如何？
27. 你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嗎？如不是，你覺得自己是甚麼人？
28. 你長大後希望在哪裏定居？

The Cultural and Civic Identity of Cross-Boundary and Newly-Arrive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Celeste Yuet-Mui YU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utput.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ltural and civic identity of cross-boundary students (CBS) and newly-arrived students (NAS) from Mainland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1) their views of Hong Kong society, (2) views of their “Hong Kong” and “Chinese” identity, and (3) their desired place of future residenc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two target student groups, their teachers, principals and parents; student tracking; picture recognition (of famous political figures or plac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a short essay on “My Country”. This article mainly reports on the findings of student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lthough both student groups had a positive view of Hong Kong in general, they had a very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Hong Kong society. Regarding their cultural and civic identity, the CBS, compared to the NAS, were found to be at a more transitional and exploratory stage and more uncertain as to whether they were “Hong Kongers” or “Chinese”. They were also less certain about choosing Hong Kong as their desired place of future residence than the NAS. In contrast, although more NAS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they were more certain about choosing Hong Kong as the desired place of future residence than the CBS.